

文献保护 专刊

Document Protection Issue

主办：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图书馆报

2019年10月25日

第6期



10-16 古籍珍品

《九成宫醴泉铭》

东巴文《创世经》

文津阁四库全书七万九千三百九卷

哥白尼《天球运行论》

摩尼教经典

孙璋《法语-汉语-蒙古语-满语四体合璧词典》

荀子二十卷

文苑英华一千卷

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

孝经一卷

古今杂剧二百四十二种

楚辞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六卷

谱牒双璧《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

世界记忆名录（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

经素问十二卷、本草纲目五十二卷首

一卷附图二卷）

“两陶集”与“陶陶室”

回鹘文《玄奘传》

蒙古文《格斯尔可汗传》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卷

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

清漪园地盘画样

卜弥格与《中国植物志》



汇聚典籍珍品, 尽显文化魅力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珍品背后的故事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承办,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及各参展单位协办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于2019年9月7日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二、三、四展厅正式开展。大展汇集了全国20多个省40余家公藏单位、30余位私人藏书家的珍贵藏品330余种。本次大展以全面阐发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精髓,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相关单位在中华典籍传承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果为宗旨,通过精练深刻的图文内容,珍贵罕见的古籍善本,丰富鲜活的科技互动手段,为观众奉献一场“让古籍活起来”的精神文化盛宴。本期,《图书馆报》将对其中的21件珍品进行介绍,带您了解这些珍品背后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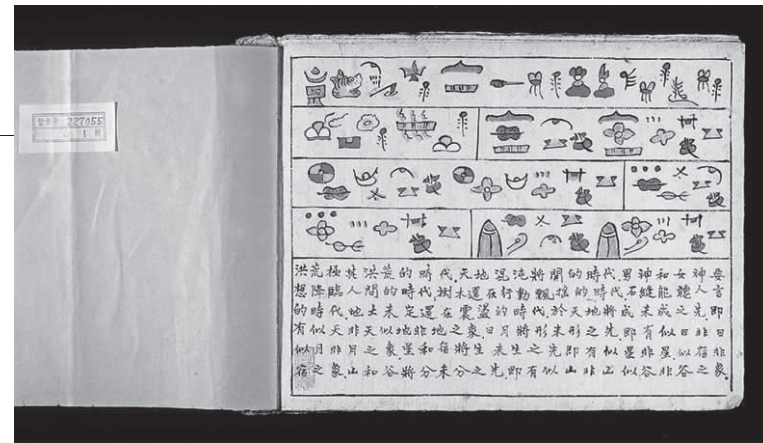
《九成宫醴泉铭》

《九成宫醴泉铭》,又称《九成宫》,是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代表作。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贞观初任太子率更令,故世人称欧阳率更。欧阳询尤工书法,初学王羲之、王献之,后渐变体,劲险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自成一派,世称“欧体”。欧阳询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家。

《九成宫醴泉铭》唐贞观六年(632)由魏征撰、欧阳询正书。原石立于陕西省麟游县,现存于陕西省麟游县博物馆。碑高310厘米,宽118厘米。凡二十四行,行五十字,额篆书题“九成宫醴泉铭”六字。碑左侧刻宋元丰年间各家题名,右侧刻宋绍圣及明正德、嘉靖年间各家题名。此碑是记载唐太宗在其行宫——九成宫避暑之事。九成宫,原为隋朝仁寿宫,隋文帝时所建,在陕西麟游县西五里天台山,于隋义宁元年(618)废。唐贞观五年(631)复置,更名为九成宫。唐永徽二年(651)更名为万年宫,至乾封二

年(667)复改为九成宫。九成宫是隋唐两朝皇家避暑胜地,一度成为帝王接待大臣、处理要务的政治中心。据碑文记载,唐贞观六年夏历四月,因宫内乏水源,太宗与文德皇后偶然于宫殿一隅发现一泉眼,“俯察厥土,微觉有润,因而以杖导之,有泉随而涌出,味甘如醴”。此为祥瑞之兆,太宗敕召魏征、欧阳询分别撰文、书丹。此碑为欧阳询七十六岁奉诏所书,笔笔精妙,一丝不苟。其用笔遒劲而不失婉润,结字方正而巧寓险峻。

国家图书馆藏此本为北宋晚期拓本,为杨绍和旧藏,后归旌德吕伯威。此本前有江尚题签“宋搨醴泉铭”,并钐“蔗畦”印。尾有江尚、梁焘题跋,钐“梁闻山收藏印”“东郡杨绍和观”“杨绍和审定”“宣子孙”“焘”“梁焘私印”“闻山父”“餐研主人”等印。此本拓工略显粗糙,且有虫蛀。拓本共十三开,半开五行,行九字,乃《九成宫》剪裱本中开本最大者。



东巴文《创世经》

写本 线装 国家图书馆藏 纳西族自称“纳西、纳、纳日、纳汝”等,他称“么些”“摩梭”,主要聚居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少数民族居住在四川、西藏等省区。纳西族源于我国历史上的古羌人,先民可追溯至汉代。纳西族文字包括两种不同体系的文字,一种是图画象形文字,纳西语称为“森究鲁究”(森即“木”、鲁即“石”,究即“痕迹”,意为“刻在木或石上的痕迹”),另一种称为“哥巴特额”(即哥巴文),是标音音节文字,“哥巴”意为“弟子”。这两种文字多为纳西族经师“东巴”(意为“智者”)抄写经文时使用,因此统称为“东巴文”,其抄写的经书称为“东巴经”。

东巴经一般采用当地木本植物皮制成的厚棉纸书写订册而成,长8~9寸,宽约2寸,用锅底灰与动物胆汁制成的墨及竹笔从左至右横写,一般每页3行,每行约有两三个直线分段。历代东巴用东巴文记录的宗教祭词及其他相关资料,经过长期加工整理,融入民间口头文学等内容,形成了卷帙浩繁的东巴文古籍文献。目前已知存世东巴文古籍有3万多册,分别藏于我国的丽江、昆明、北京、南京等地,以及美国、德国、西班牙等国。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东巴文创制于7世纪,因其年代久远,流传至今且仍在小范围使用,因此被誉为“当今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2003年8月,丽江东巴文古籍文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由此,东巴文古籍也成为中国少数民族首项世界记忆遗产。

国家图书馆历来重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采访与保护工作。抗日战争期间,我国西南地区既是正面战场的指挥枢纽,也是教育文化的中心阵地。由此,以少数民族文献为代表的西南文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中外各方人士采访与研究的热点。其时,美、英、德、法等外国学者与文物藏家纷至沓来,伺机搜掠西南地区的珍贵文化遗产。为了保存独具特色的西南少数民族文献,避免珍贵文化资源湮没毁坏或流失外邦,1941年7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委派馆员万斯年(1908~1987)先生,前往丽江对东巴文古籍进行抢救性采访。8月8日,万斯年先生抵达中甸,立即着手与当地大姓、东巴经师等建立良好关系,在逐渐熟悉了当地民风民情后,其采取亲购与委托两种方式进行现场采访。至1942年11月8日离开丽江之际,共采集得东巴文古籍3200余册,其中包括此清抄本东巴文《创世经》。该书不仅反映了古代纳西族民众对自然与人类起源的基础认知,而且塑造了纳西族始祖崇忍利恩和衬红褒白英雄形象,是研究纳西族宗教哲学、婚姻风俗与社会形态发展的重要参考文文献。该书已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国家图书馆已与学苑出版社签署出版合作协议,不久馆藏东巴文将全部公布,可以化身千百,以广流传,并提供学界更丰富的研究资料。



文津阁四库全书七万九千三百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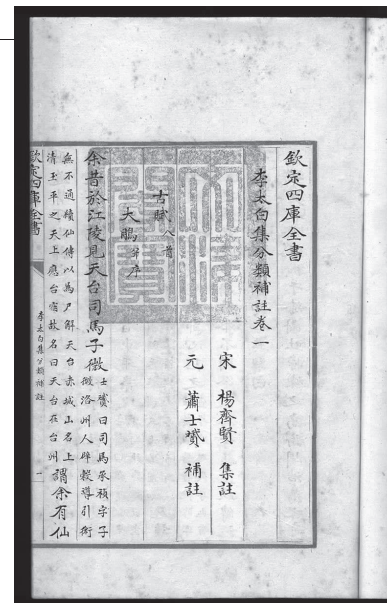
(清)永瑢、纪昀等纂修 清乾隆内府写本 国家图书馆藏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官修丛书,纂修于清乾隆年间。它所收之书,几乎囊括先秦至清乾隆间各类重要典籍,内容涵盖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共收书三千余种,三万六千余册,分装六千余函,按经、史、子、集四部度藏。先后抄成七部,贮藏于北京故宫文渊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以上称“北四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以上称“南三阁”)。其中文源阁藏本被八国联军焚毁,“南三阁”除文澜阁藏本残留部分外,全都毁于太平洋战火,仅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藏本至今尚保存完整。

文津阁《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季分为四色裝潢,以便检阅。其书共36304册,分装6144个书函,陈列摆放在128个书架上。它是七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并且是现今唯一一部仍是原架、原函、原书一体的《四库全书》。其在子部第32.33架的侧板上刻有乾隆御笔“题日五代八韵”。书函中央板、丝带、铜环一依当年。翻开书册,即见“文津阁本”朱印、“纪昀覆勘”黄笺、雪白的开化纸和端正的馆阁体楷书,令人叹为观止。

文津阁《四库全书》是“北四阁”中最晚抄完的一部,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主要表现在文津阁《四库全书》对已发现的讹误、遗漏有所补正,

而且文津阁本是档案明确记载经过乾隆皇帝亲自校对并由纪昀亲自三校的抄本。文津阁本还钐有“嘉庆御览之宝”印章,说明至嘉庆时仍在补抄,这也是其他阁《四库全书》所没有的现象。

《四库全书》在中国文化典籍史乃至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文津阁《四库全书》与“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珍藏。该书原藏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民国四年(1915)入藏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先后经历了故宫文华殿、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中南海居仁堂、文津街老馆、白石桥新馆和国家图书馆二期新馆六次搬迁,今得妥善的保存和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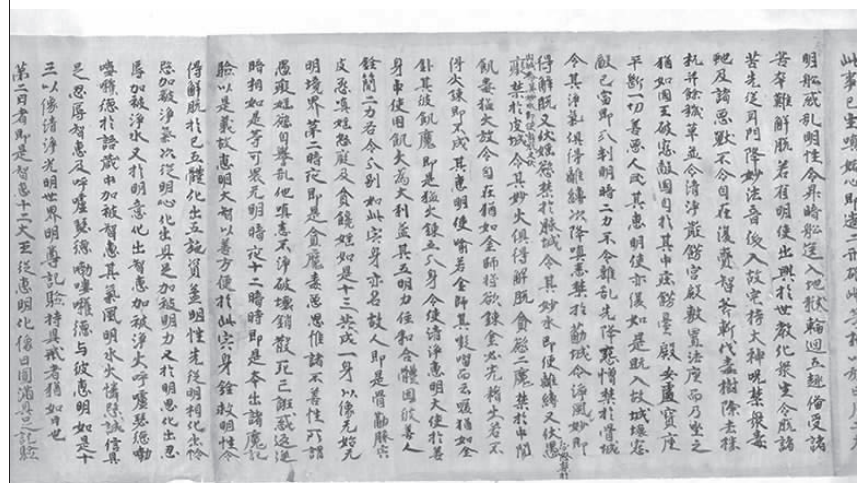
摩尼教经典

唐写本 国家图书馆藏 摩尼教,又称明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宗教。摩尼教主主张善与恶的二元论,认为宇宙间充满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他们建立了严密的教团组织和宗教制度。在波斯,摩尼教被视为异端,摩尼本人被处以极刑,信徒因而转向东方。4世纪初,摩尼教经由中亚传入我国中原地区。8至9世纪,回鹘汗国奉摩尼教为国教,回鹘僧侣在中原地区兴建寺院,摩尼教盛行一时。会昌三年(843),唐武宗灭佛,摩尼教也被禁止,此后秘密流传于民间,并影响了唐以后的多次农民起义。摩尼教的大部分文献,也因被禁而失传。可贵的是,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中,有一件摩尼教经典。

虽然学者们对这部经典的经名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能确定在吐鲁番出土的粟特文残片中,就有能与它对应的文本。毫无疑问,它是一件重要的摩尼教文献,对于研究中古时期的宗教、社会、中外文化交流,都有很高的价值。较早探访敦煌莫高窟并攫取了数千件珍贵文献的法国人伯希和,曾经在给中亚和远东探险国际协会法国委员会主席塞纳的信中得意地说:“未经我过目而弃置的,我不敢说绝对没有。”后来,伯希和又在一次演讲中说:在近两万个卷子中,只后悔看漏了一个。当时在场听讲的荷兰汉学家杜文达指出,伯希和后悔看漏的卷子,就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这件摩尼教经。

这件摩尼教经长639厘米,保存了17纸,共345行,近7000字。可惜的是,它的首尾都残缺了,没有留下经名的信息。敦煌学家们很早就注意到了它。1911年,罗振玉便整理并发表了它的录文,称其为“波斯教残经”。同一年,法国学者沙畹和伯希和将罗振玉的录文翻译成法文,并考定其为摩尼教经。后来还有多位学者研究过这部经典,陈垣怀疑它不是延载元年(694)摩尼僧拂多诞献给武则天的《二宗经》,林语堂则认为它可能是《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提及的摩尼第五部经典《钵迦摩帝夜》,即《证明过去教经》。

这卷残经行文与佛经相似,以教主与弟子问答的形式,阐发摩尼关于人类自身并存的明暗二性的教义。它是中國所存敦煌遗书中唯一的一件汉文摩尼教经典长卷。摩尼教的汉文经典存世极少,敦煌遗书中另有两件,其一抄写《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和《下部赞》,裂为二段,分藏在英法两国;其二为《下部赞》,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我们仅仅能根据这些有限的资料,和为数不多的中亚语言文献,来了解摩尼教这个中古时期一度盛行、影响颇广的世界性宗教。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是全人类的瑰宝。



哥白尼《天球运行论》

“在激励人类心灵的各种文化和技术研究中,我认为首先应当怀着强烈感情和极大热忱去研究的,是那些最美好、最值得认识的物体。这门学科探究的是宇宙神圣的旋转,事物的运动、大小、距离,出没以及天上其他现象的原因,简而言之就是解释宇宙的整体现象”,这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其代表作《天球运行论》引言中发出的慨叹。这包含一切美好事物的“天”(caelum和mundus),是教会、学者、诗人、民众都希望探究的顶峰。

当时,通行的《儒略历》已不够准确,大家都期盼有更精确的历法。作为神父,哥白尼有足够的现实理由去重新认识宇宙体系。在波兰的最北部弗龙堡的天主大教堂里,他潜心思索,完成了日心说体系的创建。1533年,教皇的私人秘书向教皇和一些红衣主教转述了哥白尼体系的设想,一位红衣主教舍恩贝格写信给哥白尼说:“我听你说您主张地球在运动,太阳的位置最低,因而是宇宙的中心……还听说您为这一套天文学体系给出了说明……因此我强烈恳请您让您的学界知晓您的发现”。

1539年,年轻的路德教徒雷蒂库斯给哥白尼带来了五部科学著作,并劝说他哥白尼出版自己的作品。不过,谨慎的哥白尼仅授权雷蒂库斯出版了一本概述性质的小册子,即1540年版《首次报告》。不过,这个小册子在天文学界受到广泛关注。哥白尼最终许可雷蒂库斯继续印全书。1543年,德国印刷商彼得·乌斯率先出版了五百部印本。1566年在巴塞尔印刷第二版时,则加

上了《首次报告》。

此书出版后并未受到教廷的批评,而关注它的天文学家们虽然并不完全相信,却对哥白尼的数学技巧非常欣赏。哈佛大学金格里奇教授曾全球踏访,查阅现存601部的《天球运行论》(第一版277部和第二版324部),从普查结果中可见,哥白尼同时代的天文学家藏本都带有各种批注。例如爱丁堡皇家天文台克拉福德图书馆藏本,有大量批注,来自天文学家雷因霍尔德·德·威特。他借助哥白尼的数学工具,编著了《普鲁士星表》,对《格里高利历》的制定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直到1610年,由于哥白尼理论的影响日渐扩大,罗马教廷才把日心说列为异端,1616年把《天球运行论》列为禁书。

此书传入中国后,先后有《天旋论》《天体运行论》和《天球运行论》三种译名,近年来,吴国盛等学者指出,这种译法对“orbium”的理解有偏差,因为哥白尼本人接受的是古希腊天文学传统,接受的是“天球”的概念,当译作“天球运行论”。

国家图书馆所藏第二版《天球运行论》为软皮装帧,封面和书根有手写题名。题名页有雷蒂库斯之名的一句被划掉,另带有意大利耶稣会士罗雅谷的签名。明末,罗雅谷与汤若望等一起参与修纂《崇祯历书》,译用了《天球运行论》第4、5卷内容,引用了哥白尼17项观测记录。入清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加以改撰,进呈清廷后,得以《时宪历》之名颁行于世。显然,明末清初的来华传教士,已经在阅读和使用哥白尼的著作,并且将之传播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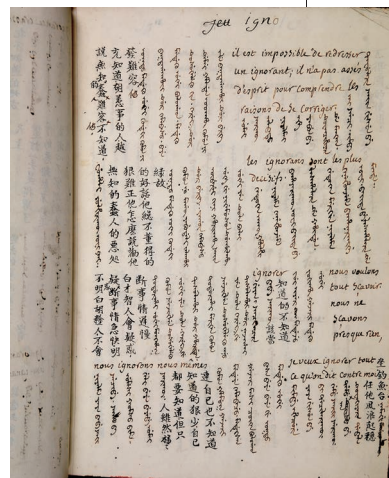
孙璋《法语-汉语-蒙古语-满语四体合璧词典》

孙璋 (Alexandre de la Charme, 1695—1767), 字德昭, 玉峰, 法国耶稣会士, 作家、天文学家和翻译家。1695年出生于里昂, 1728年来华, 1767年逝世, 曾任法国传教区的司库。孙璋在华多年, 中文熟练, 曾翻译《诗经》为拉丁文。其所翻译的《诗经》, 附有详细注释。但由于各种原因, 此译本直到1830年才由法国汉学家朱利斯·莫尔(Julius Mohl)编辑出版, 是为《孔夫子的诗经》(Confucii Chi-king sive liber camminus)。此外, 孙璋还著有中文著作《性理真途》。

词典》按照法语词条的首字母顺序排列, 共六卷。第一卷拊叶上有笔注。前两卷前半部分正反页均有字, 其余几卷只书于正面, 共4920页。从笔迹上判断, 法语、蒙古和满语以及简短的汉语应该出自同一人之手; 而那些较长的汉语为毛笔书写, 其笔法流畅, 书写者当受过专业训练。国图所藏, 蓝色布面精装, 保存状况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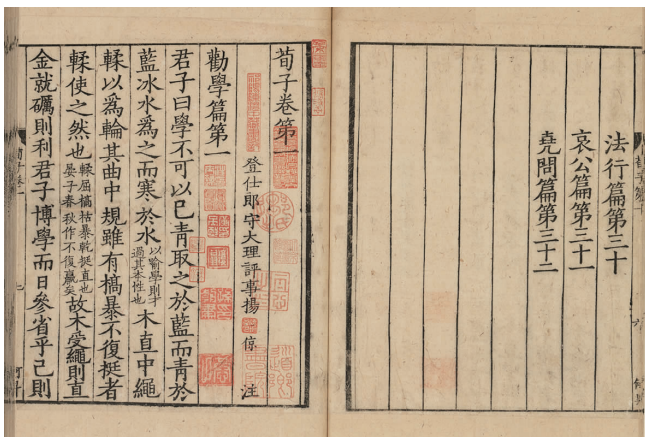
明清时期, 西方来华传教士出于汉语学习的需要, 编撰了各种汉语语法书、会话教材以及汉外双语词典, 汉外词典多以稿抄本形式流传, 如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eri, 1543—1607)、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所编的《葡汉词典》、叶尊孝(Basilio Brollo, 1648—1704)的《汉拉词典》等, 这些词典是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的重要工具书, 有助于在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 并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奠定了基础。但历史上记载的众多手稿汉外词典, 存留至今的不多, 而且多数作者和编写时间难以考订。《法语-汉语-蒙古语-满语四体合璧词典》囊括了四种语言, 内容丰富, 卷帙浩大, 有幸留存至今, 为十八世纪汉语研究、在华传教士汉语知识的传承和流变、中西文化交流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素材, 具有重要的文献和文物价值。



荀子二十卷

《唐》杨倞注宋刻本 顾广圻跋 国家图书馆藏 《荀子》为战国时荀况的文集。荀子, 名况, 字卿, 生卒年不详, 战国末期赵人。荀子继承儒家学说, 并有所发展, 为先秦时期继孔子、孟子之后最有成就的儒学大师。他主张须由圣人制定礼义, 进行教化, 才能使人转而为善, 社会更加安定。在政治上隆礼重法, 在君民关系上重视民本, 在天人关系方面, 荀子认为应顺应自然规律, 荀子还主张以名证实。这些观点在《荀子》一书中都有表述。



这部宋刻宋印《荀子》, 字大如钱, 墨如点漆, 刊印精美。原多著录为北宋监本, 经考证, 应刻于南宋时期。书中钤有“孙朝肃印”“士礼居”“汪士钟藏”“韩应陛鉴藏宋元名钞各校各善本于读有用书斋印记”等藏书印鉴, 曾为藏书名家孙朝肃、黄丕烈、汪士钟、韩应陛等人珍藏。

此书后由陈清华以万金购得。陈清华(1894—1978), 号澄中, 湖南邵阳人, 曾留美, 回国后从事金融业, 20世纪30年代后, 开始收藏中国古籍善本, 先后获韩氏读有用书斋、袁氏后百宋一廬、瞿氏铁琴铜剑楼、傅氏双鉴楼等旧藏秘籍, 藏

书数量迅速增长, 宋元善本、明清钞校稿本, 罕见善拓, 逾五百部, 普通善本古籍不计其数。其藏书数量之大、质量之高, 于江南无匹敌者, 与天津周叔弼并称“南陈北周”, 成为民国间两大藏书家之一。陈清华携《荀子》拜见著名藏书家傅增湘, 傅先生笑称: “君非以万金得熙宁《荀子》者乎? 是可以‘荀’名其斋矣”, 由此陈氏藏书室以“郇斋”命名。陈清华后来移居香港, 1965年, 有意出售所藏善本, 其中即包括此《荀子》。周恩来总理为避免这批珍贵文物外流, 责成文化部指派专人前去洽办, 在国家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 斥巨资购回。此批善本现妥善收藏于国家图书馆。

文苑英华一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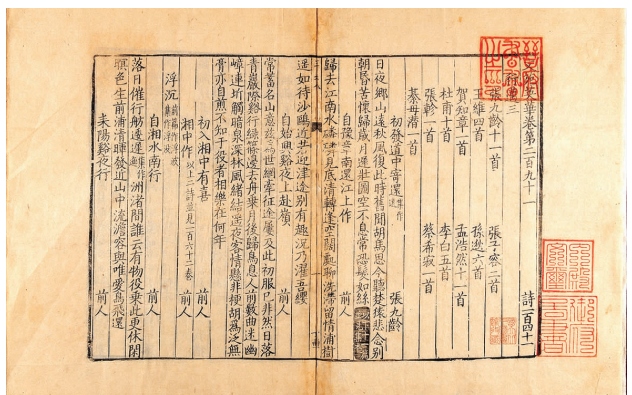
《宋》李昉等辑 宋嘉泰元年(1201—1204)周必大刻本 存一百三十卷 国家图书馆藏 被称为宋四大书之一的《文苑英华》, 成书于宋雍熙三年(986), 由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奉敕编纂。全书一千卷, 收文上起自南朝梁末, 下迄唐末五代, 以唐代作品为多。全书录作家二千二百人的约二万篇作品, 因选材、体例与《昭明文选》相类, 时间与《文选》相衔接, 后可视为《昭明文选》的续作。编修时讹误较多, 体例亦嫌驳杂, 后又几经删补。南宋宁宗庆元初年, 周必大致仕, 退居林下, 组织校勘《文苑英华》, 并亲自主持完成刊刻。

《文苑英华》成书之时, 雕版印刷初兴, 此书于柳宗元、白居易、权德舆、李商隐等人诗文集收入, 成为后人的赏鉴、辑佚、校勘、考订之依据。《文苑英华》所辑文献丰富, 《四库全书》《全唐诗》《全唐文》《全六朝文》等书之相关部分诗文, 多取自此书。书中所收诏诰、书判、表疏诸篇, 亦可订载籍之是非、补史传之阙漏。此书可谓著作之渊海, 史料之府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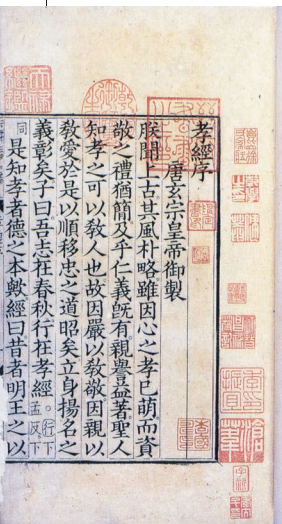
周必大所刻《文苑英华》是此书第一个刻本, 也是宋代唯一的刻本。此本开本宏朗, 刻成后进呈内府, 内府用黄绫装裱, 皮藏于南宋皇家藏书楼缉熙殿。千卷巨帙, 每十卷装为一册, 共计百册。刻成五十六年后, 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 内府包背臣曾检查书品, 在未发现问题时在书册上钤有木记。据国家图书馆现存的十三册看, 木记内容为“景定元年十月朔六日装裱王润照管讫”(各处时间略有不同)。宋版书记装帧人姓名, 仅此一见。

《文苑英华》原为千卷, 然存世寥寥。藏于国家图书馆者共一百三十卷十三册, 其中的十册为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接收内阁大库拨交, 三册为藏书家周叔弼、傅增湘先生或捐赠或转让而来。台湾“中央研究院”尚有宋版《文苑英华》十卷一册。1995年, 嘉德秋季拍卖会上出现这部书的另外一册, 书原藏著名藏书家陈清华之郇斋, 近代著名藏书家傅沅叔跋于其上。当时文化界、新闻界和收藏界引起极大轰动。然此书最终并未回归故园, 令人深以为憾。宋版《文苑英华》存世数量至此可知为一百五十卷十五册。千卷巨帙, 今仅此而已。

国家图书馆藏本保留了宋代的蝴蝶装原有装帧形式。均钤有“缉熙殿藏书印”“内殿文玺”“御府图书”三枚南宋皇宫藏书的印章。明代此书曾是文渊阁插架之物, 后经晋藩收藏, 有“晋府图书之印”“敬德堂章”等印。入清后书归内阁大库。



孝经一卷



《唐》玄宗李隆基注 陆德明音义 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 《孝经》以孝为中心, 集中阐发儒家伦理思想。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 注解《孝经》者达几百家; 唐代更被誉为经书, 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注解, 陆德明为其注音。长期以来《孝经》被看作“孔子述作, 垂范将来”的经典。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这部《孝经》为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 为天禄琳琅旧物。《天禄琳琅书目》及《四库全书总目》均认为相台岳氏群经为南宋时岳岳之孙岳珂所刻。后学者考订, 相台本群经乃元初义兴(今江苏宜兴)岳浚据宋末廖莹中世琛堂校刻九经本校正重刻, 岳浚是岳岳的九世孙, 因岳岳是相州汤阴人, 故称相台岳氏。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所刻群经, 以版印精

美闻名。此本原为明代晋府旧藏, 有“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 入清进经季振宜、徐乾学收藏, 后归内府天禄琳琅。书中钤有“太上皇帝之宝”“八征耄念之宝”“五福五代堂宝”“乾隆御览之宝”等皇家印玺。

此书后为周叔弼收藏, 周氏藏书以富而精享誉海内。周叔弼曾总结善本的“五好标准”云: “版刻好, 好比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 纸张好, 印刷好, 好比后天营养好; 题跋好, 好比此人富有才华; 收藏印章好, 好比美人梳妆, 幽幽素雅; 装潢好, 好比衣冠整齐。”此《孝经》堪为符合五条标准的代表书籍。周叔弼收得《孝经》后异常兴奋, 专门治“孝经一卷人家”印, 以示珍爱。

周叔弼先生收得《孝经》后, 上海涵芬楼曾借以影印。不久, 涵芬楼又以佳纸影印《孝经》二十部, 酬赠周先生。周先生本人也曾以珂罗版彩印, 比原本略大, 书中原有收藏印都用红色套印, 非常逼真后又付工影刻。影刻本笔致神韵, 直逼原本。孤本秘笈在周先生手中不仅安全传承, 而且化身千百, 流传世间。



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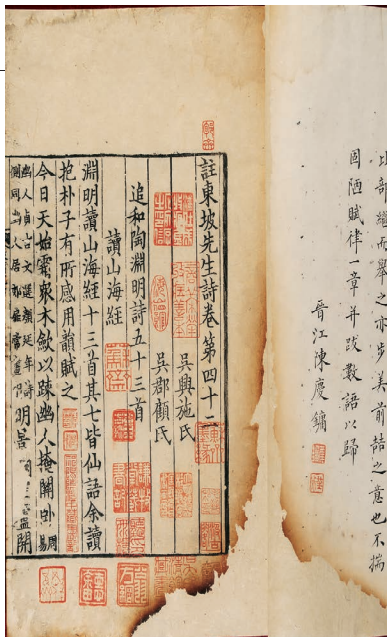
《宋》苏轼撰 《宋》施元之 顾禧注 宋嘉定六年(1213)淮东仓司刻本 宋葆淳 陈庆鏞 易顺鼎 王仁俊 张曾踈跋 吴湖帆题画 存一卷 国家图书馆藏 苏轼(1037—1101)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 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诗词、散文乃至书法, 代表宋代的最高成就, 备受后世文人的仰慕和推崇。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 清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内閣学士翁方纲在北京购得宋刻本《注东坡先生诗》影响最大, 传本也较多。此宋刻施元之、顾禧所注《注东坡先生诗》传本稀少, 极其难得。施元之子施宿作《苏轼年谱》附之, 并请陆游作序, 陆游序对施氏注本评价极高。

相较于其他宋版苏轼诗集, 《注东坡先生诗》收诗最多, 其卷四十一、四十二《追和陶渊明诗》107首以及书后附录的施宿所撰《苏轼年谱》, 为他本所无。此本还有两大优点: 一是施元之与顾禧合注, 在考证人物, 援据时事方面胜于他本; 二是版刻精美,

由善写欧体字的书法家傅穉手书于版, 故而字体极其俊秀, 加以纸白墨黝, 刊印至精, 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十分突出, 深为藏书家所称赏。惜其宋刻原本至清代已罕见, 清代翁方纲和黄丕烈各自收藏过一部残本, 书中累累的藏书印及藏书题记, 均透露出它们各自的传奇经历。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 清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内閣学士翁方纲在北京购得宋刻本《注东坡先生诗》, 此书曾经明代锡山安国、毛氏汲古阁、清初商丘宋荦、扈叙等名家递藏, 实属无价珍宝。翁方纲因此而自号“苏斋”, 并给自己的书室取名“宝苏斋”。每年农历十二月十九苏东坡生日, 翁方纲都要召集亲朋好友、硕儒名彦至家中, 展示此书, 焚香祭拜, 设宴鉴赏。乾嘉以来名流如翁方纲、桂馥、阮元、何绍基等手跋、题记、观款尽留书上; 又有翁方纲四十岁小像, 顾颉泥金绘梅花, 东坡生日消寒图等, 堪称宋版书中至为名贵者。清



末湘潭袁思亮在京为官时, 以万金之价购此书于汉阳叶氏, 一时轰动京城。不料数年后, 位于北京西安门外的袁宅失火, 火势猛烈, 延及此书, 袁思亮痛惜宝书, 几欲以身赴火, 与之俱焚, 幸为家人拼死冒火救出。此书过火而未毁, 如有神物护持, 成为清代书林佳话。遗憾多册书口、书脑严重受损, 各卷内容及题跋有所损毁, 后人因此称之为“焦尾本”。之后又有所散佚, 几经辗转, 其大部分(十九卷)藏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

“焦尾本”中的另两卷(卷四十一、四十二)《和陶渊明诗》是民国著名藏书家陈清华的旧藏, 经嘉德国际拍卖公司斡旋, 于2004年由海外回归祖国, 其中一册(卷四十二)连同陈清华其他珍贵藏书一起入藏国家图书馆。

苏轼是古代文化史上的千古奇才, 一生仕途坎坷, 四十五岁遭遇“乌台诗案”, 贬谪至黄州、惠州、儋州等地, 至六十五岁才遇赦回归, 尝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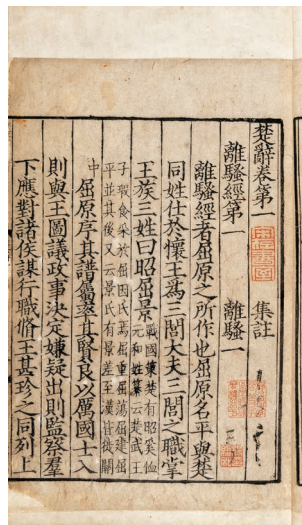
生的艰辛与苦难。他在《自题金山画像》诗中自嘲说: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然而逆境也锻造了这位伟大的文学天才, 他一生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传颂千古的名篇。后世文人对苏轼无限敬仰, 这正是残本《注东坡先生诗》为人们祭拜、赞赏的重要原因。

楚辞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六卷

《宋》朱熹撰 宋端平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灿烂篇章, 它与《诗经》一起开启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风骚传统。朱熹的《楚辞集注》是众多《楚辞》注本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 为后人治骚所必读。楚辞本是战国时期楚地歌谣的泛称。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 将楚歌楚语加工成为文人的创作, 后世又有不少模仿之作。西汉末年刘向校理群书时, 辑录战国时期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的拟作, 通称为“楚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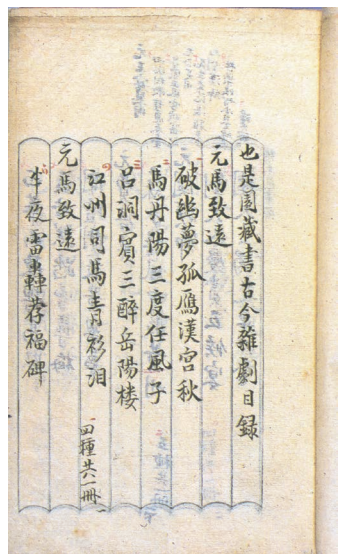
在南宋大儒朱熹注释《楚辞》之前, 已有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两部重要注本。朱熹注辞典籍往往在汇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有创见, 注《楚辞》亦如此。朱熹的《楚辞集注》重新编排了《楚辞》的篇目, 在注释方法上也与前注不同。朱熹《集注》卷一至卷五收屈原作品, 总其名为“离骚”; 卷六至卷八收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的作品, 称为“续离骚”。区分屈原作品和其他人的拟作, 明确突出了屈原在楚辞创作中的中心地位。在注释方法上, 朱熹特别强调贯通章句, 阐发义理。王逸和洪兴祖的注释皆以名物训诂为主, 朱熹以为二人未能阐发大义。朱熹《集注》基本上以四句为一章(亦有六句、八句不等), 先释字义再通释章句, 每章又加以揣摩, 系以赋、比、兴字样。由于这种贯通的理解和对作者意图的尊重, 朱熹对屈原有更多正面的评价。

国家图书馆藏宋端平二年(1235)朱熹孙朱鉴刊本《楚辞集注》, 为海内孤本, 是目前宋本中年代较早且最完整的一部。书后另附有《楚辞辩证》二卷、《楚辞后语》六卷, 前者考订旧注, 后者辑录宋玉以至宋吕大临的拟骚作品。这一部书在中日外交关系史上还有一段佳话。1972年9月,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双方为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进行着艰苦的谈判。在即将达成协议的9月27日, 毛泽东与田中进行了友好的会谈, 《楚辞集注》作为礼品赠送日方。会面后的第三天, 两国即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对古典诗词有很高的造诣。1957至1958年间, 他曾专门收集《楚辞》的各种版本及屈原原著作50余种, 其中有19种由国图提供。毛泽东送给田中角荣的就是国图藏北宋端平本《楚辞集注》的影印本, 推动了中日友好交流。



古今杂剧二百四十二种

明抄本 (内十五卷配明刻息机子杂剧选本、五十五卷配明刻古名家杂剧本) 黄丕烈原自藏 曲目并跋 国家图书馆藏 《古今杂剧》是明代藏书家赵琦美抄校的元明戏曲集, 也称《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它收录了大量元明时期的戏曲、杂剧, 是现今存世最早的元明戏曲合集。赵琦美(1563—1624), 一名开美, 字玄度, 号清常道人, 江苏常熟人。好网罗古今书籍, 脉望馆是其室名, “所聚聚凡数万卷”。赵氏钞校的元明杂剧, 清初为钱曾所得, 录于《也是园书目》中, 故又称《也是园古今杂剧》。该书存杂剧242种, 所收剧目颇多孤本, 版本价值、资料价值极高, 是研究元明杂剧的重要资料。



此本发现以前, 元人杂剧多赖明万历四十四年刻藏懋循的《元曲选》流传, 此书收元杂剧凡百种, 为杂剧选中最丰富的一种。黄丕烈旧藏《元刊杂剧三十种》, 中有《元曲选》未见的元剧17种; 其他杂剧选编, 仅寥寥几种可再作为补充。而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收元明杂剧242种, 种数比《元曲选》多出一倍半。这个宝库为中国文学增添了許多名著, 也为中国历史、社会史、文化史增加了大批资料。

本书由于其珍贵的资料价值, 向为世人所重。这批书在钱曾之后又经季振宜、何义门、黄丕烈递藏。黄丕烈定其名为“古今杂剧”。黄丕烈后又辗转相传于汪士钟艺芸精舍、赵宗健旧山楼、丁祖荫等处。此书流传中也不断损失, 《也是园书目》著录该书有340种, 到季振宜著录时只有300种, 黄丕烈时有266种66册, 黄手抄目录四十叶, 今附书前。而到汪士钟手里就只有242种66册。

此书入藏国家图书馆的过程也充满曲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 郑振铎先生目睹中国古籍不断流入美国、日本等国, 认为保护古籍是书生的责任, 为此郑振铎与北平图书馆等联系, 请他们筹款护书。这期间购得的书中, 就有这部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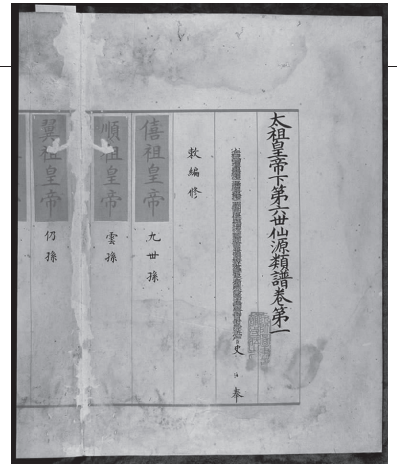
郑振铎先生认为, 此书的发现不仅是中国文学宝库、历史文献资料的重大收获, 并认为这个发现可以与内閣大库打开、甲骨文的出现、敦煌遗书的发现具有同样的意义。为此, 郑振铎先生希望这批珍贵的古籍为社会所用,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时, 曾倡印“古本戏曲丛刊”, 其中《古今杂剧》在第四辑中, 为学术研究和利用提供了便利。

谱牒双璧《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

《仙源类谱》(宋)史浩等纂修 宋内府抄本 存三十卷;《宗藩庆系录》宋内府抄本 存二十二卷 宋代皇族谱牒计分五种:玉牒、属籍、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和仙源积庆图。传世者仅见仙源类谱与宗藩庆系录两种,皆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二书因其出身之贵、家族之显、年代之久、传世之孤、文献价值之高,在现今存世的数以万计家谱中独占头魁,堪称“谱牒双璧”。

《仙源类谱》(宋)史浩等纂修 宋内府抄本 存三十卷;《宗藩庆系录》宋内府抄本 存二十二卷 宋代皇族谱牒皆以宋太祖、太宗和魏悼王为三大本支祖。《仙源类谱》的主要内容为记录宋皇室宗族成员的宗支、婚姻、官爵迁转、功罪是非以及卒年月。对每一位有官爵的男性宗族成员的任职经历记载详实,对于女性宗室成员,只附属籍、记其婚姻状况。《宗藩庆系录》原名为《宗藩庆绪录》,北宋哲宗时改为今名。主要内容是“辨谱系之所自出,序其子孙而列其名位品秩。”它以记载宗室成员的世系传承关系为特色,同时简要地记载子孙后代的品秩。它以记载宗室成员的世系传承关系为特色,同时简要地记载子孙后代的品秩。简言之,仙源类谱重“官爵迁叙”,宗藩庆系录重“辨谱系”。

北宋时期,皇族谱牒的定期修纂制度逐渐形成。皇族谱牒由宗正寺修撰,由右丞担任提举编修官。并规定,仙源类谱每十年一修纂呈进,宗藩庆系录一年一修纂呈进,但并未严格执行。宋室南渡后,因北宋时期所修皇族谱牒无存,朝廷下令重修。据史料记载,《仙源类谱》在南宋时期成书三次:即绍兴二十七年(1157)的《三祖下上五世仙源类谱》,淳熙五年(1178)的《三祖下第六世仙源类谱》和嘉定六年(1213)的《三祖下第七世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南宋时期共成书三次:淳熙元年(1174)的《三祖下上五世宗藩庆系录》,淳熙十三年(1220)的《三祖下第七世宗藩庆系录》。



考。两书先已残破不堪,后经国家图书馆抢救性修复,面貌为之一新。但由于众多残页无法缀补,最终只得《仙源类谱》三十卷、《宗藩庆系录》二十二卷。两书为南宋内府抄本,装饰典雅华贵,书衣为皇室专用的明黄色织锦,开本阔大,纸墨俱精。

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十二卷

(唐)王冰注(宋)林亿等校正(宋)孙兆改订 元后至元五年(1339)胡氏古林书堂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撰成于战国至秦汉间,为时人总结旧说而成,编撰者难以稽考。成编后冠以黄帝之名,借以取重于世。《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素问》以黄帝与岐伯等上古名医问答的形式,阐述了中医对于病理、药理、诊断、治疗等方面的见解;《灵枢》则针对脏象、经络、及针刺之法,进行系统的论述。汉以后,《素问》单行传世,独立成书。最早为《素问》作者为南北朝时的全元起,该注本南宋以后失传。唐王冰在全元起注本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注释,将旧有的《素问》八卷析为二十四卷。对于篇次更改处,王冰之每篇之下注出全元起本旧貌,仍然能够见其原来面目。宋嘉祐年间(1056-1063),校正医书局林亿、高保衡等人奉敕对王冰注本《素问》加以校勘,正谬误六千余字,增注释二千余条,并由政府刊印颁行。其规模之大、质量之优,均前所未有,为历代医家所珍重,故林亿等校本成为后世《素问》各种版本之祖本。

《素问》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二十四卷本和十二卷本两个版本系统。现存最早版本是金刻二十四卷本,借仅存十三卷;传世十二卷本中,以元至元五年(1339)胡氏古林书堂刻本刊印最早且卷帙完整。胡氏古林书堂在元后至元年间曾集中刻印一批医书,如《新刊黄帝内经灵枢》《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五运六气诸图附论》《黄帝内经素问遗篇》等,并流传至今。此本铃有“树叶麻印”“铁琴铜剑楼”等印记,曾为明末清初树叶麻、清未翟氏铁琴铜剑楼先后收藏。2011年,《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是中国中医药典籍进入世界文献遗产保护工程的一项重要成果。

本草纲目五十二卷首一卷附图二卷

(明)李时珍撰(明)李建中李建元校正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金陵胡承龙刻本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草纲目》是中国明朝李时珍(1518-1593)撰写的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著述。《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学成就,详细描述了1892种植物、动物、矿物、金属,以及它们的药性和药用。《本草纲目》的出版不仅改进了传统药物书的编纂和药物分类方式,在研究古代生物学分类方面具有重要科学价值。李时珍(1518-1593)是明代蕪州(今湖北蕪春县)的一位名医。他出生于世医之家,从小受到医学熏陶。他历经27年(1552-1578),稿凡三易,动员子孙、门人参与校订,终于纂成《本

草纲目》。《本草纲目》自问世之后,版本众多。明万历二十一年金陵(现南京)胡承龙刻本是目前可见的《本草纲目》的最早版本,也是迄今为时唯一一个由李氏家族自己编纂的版本。后世诸多《本草纲目》版本均在金陵版基础上衍化翻刻而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问世之后,不胫而走,400多年间翻印了100多次。该书不仅得到了中国古代众多医药学家和社会名士的高度赞誉,也在东被西渐的历史进程中,受到了东方邻国和西方世界医药及科技人士的一致称颂。达尔文称《本草纲目》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该书从17世纪初开始,即逐渐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传播。

“两陶集”与“陶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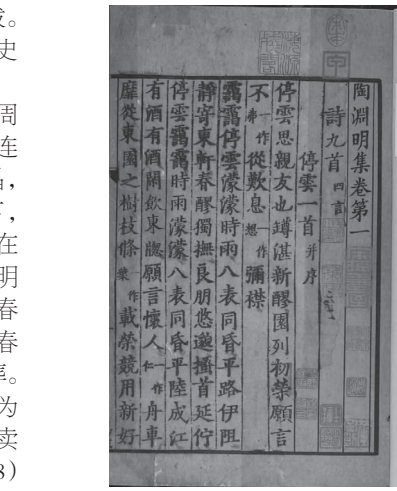
《陶渊明集》十卷(晋)陶潜撰 宋刻递修本 金俊明、孙延题签汪骏昌跋 国家图书馆藏;《陶靖节先生诗》四卷 补注一卷(晋)陶潜撰(宋)汤汉注 宋刻本 周春、顾自修、黄丕烈跋 孙延题签 国家图书馆藏 国家图书馆珍藏古籍善本中珍稀佳品琳琅满目,其中两部书尤为引人注目,它就是充满传奇经历的“两陶集”。

“两陶集”指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旧藏的南宋刻十卷本《陶渊明集》和南宋刻汤汉注四卷本《陶靖节先生诗》。陶渊明,晋代著名诗人,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后世文人对他崇尚自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故而格外重视对陶集的收藏。陶渊明的诗集、文集在宋代屡经刊刻,出现过六卷、七卷、八卷等多种版本,但十卷本《陶渊明集》内容最全,影响也最大,成为后来的通行本。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是陶渊明诗歌的第一个注释本,其版本价值不言而喻。这两部书均用宋朝金粟山藏经笈作护叶,亦足以看出藏家对它们的珍视。

《陶渊明集》有黄丕烈亲笔所题“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一本”,系黄丕烈收藏的第一部宋刻《陶渊明集》,在黄丕烈收藏之前,此书曾经文征明长子文彭、毛氏汲古阁旧藏。

《陶靖节先生诗》书末有黄丕烈墨笔书“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二本”,是黄丕烈所收藏的第二部陶集。该书迭经明代董宜阳、项禹揆、清代周春、黄丕烈、汪士钟、杨氏海源阁递藏,书中印记琳琅,且有清乾隆嘉庆时期周春、顾自修、黄丕烈的题跋。此书的流传经历颇具传奇色彩,是藏书史上一段著名的佳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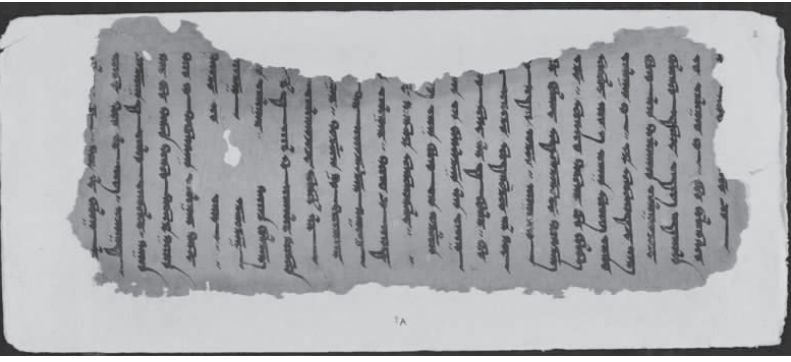
乾隆四十六年(1781),苏州藏书家周春听鲍廷博说起宋版《陶靖节先生诗》,连称好书,追问书在哪里,得知卖与张燕昌,遂假借借看,继而不还,意欲强行买下,但张燕昌不答应。僵持一年,终于在友人张载华的调停下用重达一斤的明朝叶玄卿“梦笔生花”大墨换得。周春得书不胜狂喜,手自补缀,重加装订。周春得书后秘不示人,并打算以这部书殉葬。他把此书和一部宋版《礼》书共藏一室,为书室起名“礼陶斋”。后来《礼》书先被卖出,改名为“室陶斋”。嘉庆十三年(1808)



回鹘文《玄奘传》

回鹘,原称回纥,于744年取代突厥,在漠北高原建立了回鹘汗国,使用突厥文。9世纪中叶,借用粟特文,创制了回鹘文,15世纪后不再行用。回鹘文对蒙古文和满文的创制产生了深远影响。该书全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其汉文本共10卷,由玄奘弟子慧立依其口述初纂,后经彦棕补修而成。该书前5卷详细记述了玄奘西行前个人经历及其取经途经西域、印度各地的所见所闻,后5卷记录了其返回长安后组织译经等生平情况,该书可与《大唐西域记》互相补正。

根据此回鹘文《玄奘传》第3.7、8.9卷末所載可知,约在10世纪,该书由别失八里(今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人胜光法师自汉文译成回鹘文。该书于1930年前后发现自新疆,因书商恐此书被官家没收,故不愿说明来历,仅言及该书自南疆出土而具体地点不明,并将此书拆散售出。其时,该书一部分由清华大学袁复礼(1893-1987)教授协助本馆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购得,共240叶;一部分由法国考古学家海金(Joseph Hackin)在由叙利亚至北京途中购得,共8叶,后交予德国学者冯·加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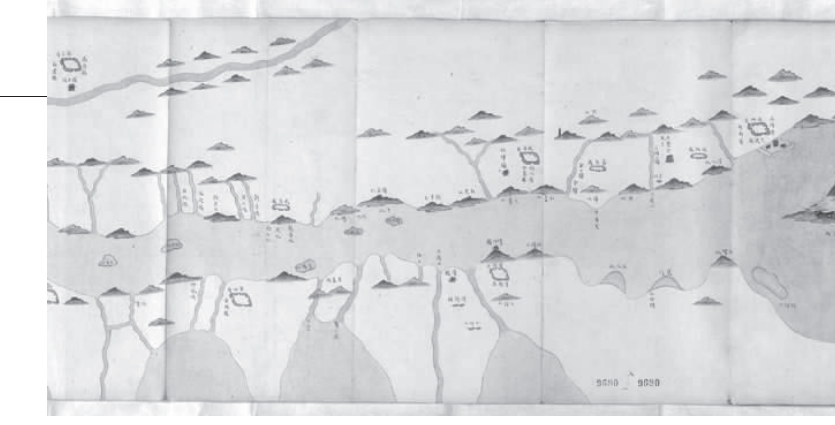
(Annemarie VonGabin);另一部分经伯希和介绍,由巴黎集美(Guimet)博物馆购得,共123叶;另有97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1932年,冯·加班将本馆所藏回鹘文《玄奘传》借走,几经催要,但均无下文。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众人均以为这部珍贵典籍已回归无望,但1946年冯·加班又将其完璧归赵,同时,她还将原属海金的8叶也一

并送还,由此,这件流落异邦的重要文物终于回到祖国怀抱。1951年,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下,季羨林、王重民先生商洽该书整理出版事宜,后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马家昇先生对该书进行整理研究,并于当年公开影印出版。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部回鹘文古籍能得到如此厚待,可见党和政府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高度重视。

蒙古文《格斯尔可汗传》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北京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格斯尔可汗传》,全称《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亦称《格斯尔》,是蒙古古典文学名著,是以主人公格斯尔命名的大型英雄史诗,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亦为蒙古族文学三大高峰之一。其主旨是“降妖伏魔,为民除害”。内容由七个章节组成,即格斯尔的诞生、智斩魔虎、固穆可汗治国、降伏十二头魔王、大战锡莱河三汗、力战蟒古斯喇嘛、大雨地狱降伏敌人等。其语言均为通俗的口语,以接近青海厄鲁特蒙古人方言生动描绘自然环境、人物形象、战争画面,仿佛一幅油画般波澜壮阔、细腻入微。《格斯尔》有多种版本,如隆福寺本、乌素图召本、鄂尔多斯本、故官本、咱雅本、诺木其哈敦本、色旺本、卫拉特托忒蒙古文本等不同版本,其中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北京刻本为唯一刻本,亦目前发现最

早版本,故而闻名海内外。各版本虽章数不等,但基本上以七章本北京版《格斯尔》为原本,略作增删而形成,全部版本中内容不重复的章数实际为十六个。《格斯尔》除了以上书面文本,还有口传文本。口传《格斯尔》章数上远远超出了书面文本(上百章)。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传承人结合当地生活习俗、思想感情、审美情趣进行再创作,不断繁衍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数量庞大的口传异文。《格斯尔》涵盖历史、宗教、民族和文化艺术等多学科内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是蒙古族千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民族智慧,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多样性,见证了各民族的互相交流、和谐发展、共同进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的瑰宝。2009年,蒙古族《格斯尔》和藏族《格萨尔》一并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

清乾隆年间彩绘本 国家图书馆藏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大运河的开凿历史,最早可上溯到春秋时期吴国为伐齐国而开凿的邗沟。后历经隋炀帝时大幅度扩建,形成北至涿郡南达余杭的南北大运河。元朝治理运河,弃洛阳而取直至元大都,形成一派南北通途的热闹景象。明清时期,漕运逐渐没落,道光二十七年(1901),漕运废止、运河分段通航,大运河开始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回想起来,京杭大运行从开凿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记载京杭大运河盛衰变化的历史文献非常丰富,但反映运河真实面貌的水利地图则比较少见。清代,随着康熙二帝的多次南巡,关于运河的专题地图才多了起来。其中有这样一类运河地图,将长江中下游和运河绘在同一卷轴上。这种绘图方式与实际情形相距甚远,看似荒谬,实则反映了运河与长江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绘图方式记录长江漕运与运河漕运线路上一段和每一点(府、州、县及其间、坝、来水河口等)的水利情形,也就是长江运河水上交通路线图,所以具有相当重要的实用价值。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就是此类运河图的代表作。

《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作者不详,整幅地图尺幅纵27厘米,横925厘米,采用山水画法彩绘,绘制年代约是清乾隆年间。此图原作为经折装,在锦缎夹板上图卷原题为“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广

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山东、直隶)。但实际图中未涉及广西的内容,所以题名应改为“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全图第一部分绘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的长江水路(由洞庭湖至鄱阳湖直至南京)的漕运情况,表明两湖漕粮运京路线:先到南京,再北上经大运河运往北京,此部分绘制比较简约,仅占全图总长的十五分之一。第二部分绘制从绍兴府及杭州直至京城的大运河。此部分绘制比较详尽,详细反映了运河沿途各府县周边水道、湖泊、山川、河流间沟通关联合济情形,且有相关文字说明,是一幅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水利工程图。此图是为清朝漕运管理而绘。运河漕运,自隋而下,历来兴旺。京城的粮食、织品等主要通过长江、运河运输。其中长江漕运也十分发达。长江沿岸是盛产粮食的地方。两湖和江西的粮食集中在九江,从九江开始船运至镇江,再由镇江京杭大运河送至京城。虽然漕运自苏杭直达京师的情景已经成为过去,但我们可凭借此图重温以上这些辉煌的历史,想象运河沿岸旖旎林立的盛景。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要求充分挖掘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是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运河的研究又开启了新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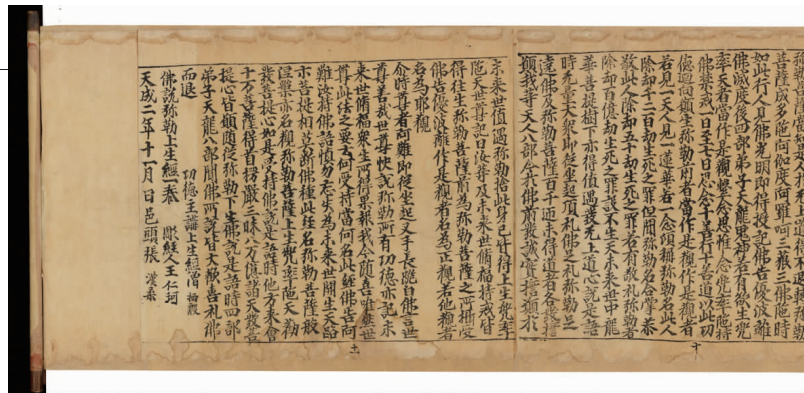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卷

南朝宋沮渠京声译 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刻本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简称《弥勒上生经》《上生经》。本经叙述弥勒菩萨命终往生兜率陀天,教化诸天,昼夜六时说法。宣说天宫庄严妙丽,清净快乐,往生兜率陀天、称念弥勒菩萨名号诸功德利益。

魏晋间,弥勒经典传入中原,以翻译和抄写弥勒经典、绘制弥勒形象、开凿和供养弥勒造像为内容的信仰活动,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逐渐传播,形成弥勒信仰,并演化为中国佛教的净土信仰。

沮渠京声,祖先天水郡临城县人,先在高昌郡求得《弥勒上生经》等经典,到凉州译出。北魏攻陷凉州时,沮渠京声避祸刘宋后,将《弥勒上生经》等传写出来,成为弥勒信仰主要经典之一。

该件外观成卷轴装。首残尾全,总长115厘米,框高22.7厘米,纸幅高26.5厘米。上下单边,目前残存四版:八、九、十、十一。卷尾后有“功德主上讲生僧栖殷”“雕经人王仁珂”“天成二年(927)十一月日邑头张汉柔”三行题记。卷尾存原木轴,轴头涂棕色漆。本件



雕版印刷《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卷末保存了三行题记,为雕版印刷史提供了重要史料。这种形式,成为后代雕版印刷典籍常常采用的模式。

本件题记为“天成二年”雕,其雕版时间较咸通九年(868)《金刚经》晚五十九年,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所知第二件有明确纪年的早期

雕版印刷书籍,也是国内保存有明确纪年最早的一件。

字体保留许多唐代俗写风格;其雕版风格具有典型北方地区的特点,粗犷、古朴。纸张成分以构皮纤维为主,帘纹比较细密,纸张厚薄均匀,韧性较好。

从版式行款分析,这是一件雕版技术与印刷、装潢工艺成熟典籍。



卜弥格与《中国植物志》

卜弥格(Michel Boym, 1612-1659),字致远,波兰耶稣会传教士。他是第一个把中国的中医草药翻译成欧洲文字的西方人,著述涉及中国动植物学、医药学、地图学等方面。

1612年,卜弥格出生于波兰-立陶宛联邦王国利沃夫(今属乌克兰),父亲是波兰国王的御医,卜弥格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629年卜弥格加入耶稣会,1642年踏上了来中国的旅程。在1645年抵达越南北圻之时,清廷正全力剿灭李自成,局势动荡,他只好去海南岛传教。

卜弥格不仅熟悉欧洲医学经典,对中国医学和本草学也有着浓厚兴趣。来华仅六年,就著有《中国植物志》《单味药》《中国医药概说》《中国脉诊秘方》《中国地图册》等多部著作。

《中国植物志》用当时欧洲医学通用的拉丁语写成,于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这是欧洲发表的第一部关于远东和东南亚大自然的著作,也是介绍中国本草最早的文献,其影响不言而喻。法国在1690年、1768年、1813年均有该书译本或编译本。

书中介绍的动植物共计29种。对于每种动植物,卜弥格都仔细标注其葡萄牙文、拉丁文和中文名称,生长区域、形质特征、药物制作方法、治疗的疾病和销售情况,并绘有插图,图文并茂,十分生动。书中对动植物的描述也很有趣,比如书中记录了一种被唤作“中国”的香料,即桂皮,他在书中透露,欧洲商人将桂皮

树译作“又香又甜的中国的树”。

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载了一种叫“中国木”的植物,但不清楚究竟是何种药物。卜弥格在《中国植物志》给出了答案:茯苓(Fo Lim)。作者解说:“葡萄牙人称中国根为Pao de Cina,欧洲人称它为China。它大量生长在云南、广西和广东省,……中国人将它和肉放在一起,用来做汤也可以做药用,能治病。这种根中国人叫白茯苓。”

《中国植物志》中还介绍了如何分辨部分药物的真假。例如,他在书中介绍鹿科动物麝时,写到可以从其身上获得一种称为麝香的名贵药材以及辨别真假的方法:“辨别麝香真伪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在火里烧,中国人认为,如果它烧了后留下的东西像木炭一样,那就是说它混杂了别的东西,而不是真正的麝香。”

卜弥格无疑是西方人研究中国植物学的开拓者。正如波兰汉学家卡伊丹斯基所说:“在欧洲,不论在17世纪还是在18世纪,都没有一个植物学家能够像卜弥格那样,根据自己在中国的实地考察和经验,撰写和发表此类文章。”《中国植物志》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关注中国动植物,并开始将中国的动植物标本、花卉种苗送往欧洲,让中国医学传向西方。

此部《中国植物志》来自瑞典藏书家罗闻达的罗氏藏书,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清漪园地盘画样

清代样式雷图档之一 国家图书馆藏 清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皇帝为了筹备其母崇德皇太后的六十大寿,开始在北京西郊修建第五座大型皇家园林——清漪园。咸丰十年(1860),清漪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十四年(1888),清漪园得以重建,改称颐和园。始建的清漪园与重修的颐和园都与清末雷姓建筑世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代负责皇家建筑样式的专门机构被称作“样式房”。自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两百余年,雷氏家族共有八代几十人供职于清廷样式房,其中多人先后担任样式房掌案,主持皇家建筑、内檐装修及家具器物设计等,成就斐然。这一建筑世家被誉为“样式雷”,其绘制的建筑图样、建筑模型、工程做法等被统称为“样式雷图档”。现存于世的样式雷图档逾万件,其中大约四分之三收藏在国家图书馆。这些图档基本是在民国年间入藏国图,一部分直接从样式雷后裔手中购得,一部分从当时的书局、书社、书斋等处购得。

国图藏有千余件和颐和园相关

的样式雷图档,然而其中和清漪园相关的仅有寥寥数幅。《清漪园地盘画样》便是其中一幅总图,主要涵盖了万寿山和昆明湖两部分,相对完整地呈现了清漪园的总体布局。“地盘样”相当于现代建筑设计所称的平面图。图中主要建筑和景点贴有黄色的名称标签,仅水域部分涂成了黄绿色。全图绘制精细,古朴大气。有学者根据图上建筑的存毁年代推断,此图应当绘制于道光二十至二十四年(1840-1844)之间,绘制者极有可能为第五代样式雷——雷景修。

样式雷图档作为手工绘制的图样,堪称孤本。即便在世界范围内的档案文献中,这样大规模、全系统的建筑图档也实属罕见。它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证资料,因此在2007年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世界记忆遗产的一部分。

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经将馆藏样式雷陆续分卷整理出版,其中颐和园卷于2018年颐和园纪念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二十周年之际首发。

